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周膺 吴晶 / 著

Hangzhou Shi Qian Shi

杭州史前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杭州史前史

周 膺 吴 晶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杭州史前史/周膺、吴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04-9710-3

I. ①杭… II. ①周…②吴… III. ①史前文化—杭州市
IV. ①K29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835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郑成花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86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辛 薇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唐龙尧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绪 言

杭州是中国早期文化最为丰富、存在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杭州市域的“建德人”是中国东南沿海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代表，而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更构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区系。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阶段龙山时代的文化纲领，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遗址之一，因此杭州的文明发源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杭州文明的发源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特别重要的有机部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由于“文明起源阶段”与“史前”概念存在冲突，本书将杭州史前史分为两个部分来研究。前期为一般意义上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即史前时代，后期文明起源阶段为原史时代。1833年法国药学家保罗·图尔纳（Paul Tournal）用“史前”（Pre' historique）一词表示法国南部纳尔榜市（Narbonne）发现的与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共存的人骨年代，并将其解读为“历史之前的时期”（Période Anté-historique）。^[1] 1851年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在《苏格兰考古与史前学年鉴》一书中首先从学科意义上使用“史前”（Prehistory）一词。1865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鲁伯克（John Lubbock）在《史前时代》一书中将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3个阶段的划分，扩充为包括史前在内的4个阶段。“史前史”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欧洲史学有了新的深度和广度。史前史指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但对文字的发明和文字的实际使用以及其在后世的保留状况却难以作准确判断，所以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又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再划分出一个“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原史”或“原史时代”直译指“最初的历史”，是没有直接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向成熟的历史时代的过渡阶段，即文字最初产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的历史时代。^[2] 这个时期正是文明发生或起源的时代。由于文字产生的时代和最初的社会文明性征较难被

^[1] Robert Fleming Heizer, *Man's Discovery of His Past: Literary Landmarks in Archaeolog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2, pp. 72-83.

^[2]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确定性界定，所以学术界对中外历史史前、原史时间范围的划分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案或意见。原史时代的时间范围，尤其是上限年代的时间范围，将会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出现而不断得以修正。中国学术界也一直未就原史时代的划分达成共识，而在学术史上还曾出现过疑古思潮，历史学、考古学界长期使用“传说时代”一词事实上传递着不可轻信原史时代的历史这样一种学术观念。但近几年来，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展开，尤其是龙山时代陶文和商周甲骨文、金文完善体制的发现，“传说时代”的不确定性被很大程度消解，使得“走出疑古时代”的自信在学术界有所增强。本书所着力论述的“龙山时代”等概念，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修正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学术缺陷。

目前中国研究原史问题的学者总体上将中国原史时代的上限确定在龙山时代。尽管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及以前的刻画符号的文字性征争议较大，但对龙山时代一些遗址出土的陶文却有比较一致的认定，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原文字时代”。再结合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来考察，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确实已可以开拓出广大的论述空间。但这种研究却未必完全拘泥于已发现的文字材料。良渚文化尚无陶寺类型文字的发现，但其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却高于陶寺类型，明显的是整个龙山时代的文化纲领。良渚文化不仅发展了规模化稻作农业、极大地扩展了人口规模，而且在发达的原始聚落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众多部落的早期方国，以社会分层系统为主要表征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在当时已相当高。高度繁荣的良渚古城则标志着城乡分化的完成和发达的早期城市的出现。发达而精美的玉器、黑陶等文物系统不仅表征礼制社会的发源，而且表明精神文化已相对于物质文化分立、人类精神有了高度自觉。

良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得缘于积淀十分深厚的史前文化地缘。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在天目山区和苕溪流域进行人类生活的早期探索和实践；进入全新世以来，宁绍平原和环太湖平原形成了广大而丰饶的湿地平原，宁绍平原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环太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逐渐摆脱攫取性采集狩猎经济，发展出中国长江流域史前最有代表性的生产性经济稻作农业经济。良渚文化综合了上述史前文化的优秀因子，在原史时代特殊的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刺激下，发展出当时中国最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创造了今天值得世界性关注的伟大文明。从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的史迹可以看到，杭州的早期先民尤其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也特别乐于进行持续不断的发明创造。他们的原创、首创、独创精神是杭州人民也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杭州的早期先民也十分重视对生态环境的观察和化用，他们用智慧来认识和利用自然因素，对环境进行适度改造，合理安排森林、农田、建筑群，将赖以生活的大地建成优良的生态家园，使人类与动植物群构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即便像杭州的前身良渚古城这般伟大的制作，也不造作、不武断，而是充分地尊重、接应、导引生态因素，没有势利

地成为唯我独尊的统治自然的工具，既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空间，又与自然系统构成良性循环，形如天然佳构。

考古学家俞伟超曾说过这样一句有意思的话：“考古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考古学或原史写作、文明史写作最终要面对古人的思想或精神世界，面对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心灵。精神或心灵虽是无形的，但它能借助于有形的东西表现出来，考古学家可以从有形的器物中还原出这种无形的东西。所以那些有形的器物可以被看做精神或心灵的化石，或者是物化了的的精神或心灵。而理解古人的精神或心灵世界，除了是对物质遗存作精神还原以外，还是一个考古学家对自身存在的还原和澄明过程。发觉古人的精神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精神；同样的，理解人类自身当下的存在又是了解古代精神的钥匙。考古学家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喜好偏爱、认识范式或心理结构来思量、考辨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将它们渗入整个研究过程，所以考古又首先是对考古学家自我精神或心灵的考古。精神或心灵考古体现了考古学、历史学的终极目标。

目 录

绪 言	1
	1
第一章 杭州史前人类生存环境	1
第一节 杭州原始文化发生的地理基础	1
一、杭州的地缘特征	8
二、杭州的地质机理	13
三、杭州的水文地理	22
第二节 杭州原始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	22
一、全新世气候和海平面变迁与杭州的聚落演替	30
二、全新世杭州的农业生态	35
三、全新世杭州的人地关系	39
第三节 中国文明在杭州崛起的时空条件	39
一、长江水动力响应与空间环境	42
二、文化因素的时间性积累	44
三、多因素互动	49
第二章 杭州史前文化谱系与主体地理文化	49
第一节 杭州的旧石器文化与最早的人类活动	49
一、杭州原始地理文化的初创及其系脉	51
二、建德人与杭州的晚期智人	53
三、苕溪与杭州最早的人类聚落	57
四、杭州最早的先民可能的人种族谱	

第二节 杭州新石器文化谱系	67
一、杭州早期的北系新石器文化	67
二、杭州早期的南系新石器文化	73
三、杭州南北两系新石器文化互动与在晚期的融汇	76
第三章 跨湖桥文化与杭州新石器时代早期主体地理文化	87
第一节 跨湖桥文化遗存	87
一、湘湖湿地与跨湖桥文化的形成	87
二、跨湖桥文化地理分布	94
三、跨湖桥文化分期	99
第二节 跨湖桥文化的特征	102
一、跨湖桥文化的聚落形态	102
二、跨湖桥文化的经济性征	110
三、跨湖桥文化的科学艺术性征	119
第三节 跨湖桥文化的广域构建性	123
一、跨湖桥文化的区域构建	123
二、跨湖桥文化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	125
第四章 良渚文化与杭州文明起源阶段主体地理文化	127
第一节 良渚文化的发生及其演变	127
一、良渚文化与环太湖流域生态地缘	127
二、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分布	131
三、良渚文化年代与分期	138
第二节 良渚遗址与杭州的缘起	140
一、西溪湿地与良渚古城的地理形势	140
二、良渚古城与杭州的发源	143
三、良渚古城与杭州最早的城市规划	144
第三节 良渚文化在杭州的主体性文化建构	153
一、良渚古城与环太湖流域文化重心南移	153
二、良渚古城与地域文化集成	155
三、良渚文化与文化播化	158
第五章 杭州原史时代地理文化对中国文明发源的特殊贡献	169
第一节 良渚古城与中国最初的复杂社会	169
一、第一古都与良渚古国的社会分层	169
二、一神教与地域集团融合	171
三、巫政金字塔与玉礼制度	176
第二节 良渚文化生业与中国早期复合经济	179
一、生产性复合经济体系的地域集成	179
二、奢侈品与精神品生产的特别强化	192
三、货殖之利与商业部门的萌生	199

第三节 良渚文化与中国最早的精神分立	202
一、俄狄浦斯王与人性自觉	202
二、亡灵书与生死观	209
三、创意谋划与美学意象	215
四、新话语与科学思想痕迹	223
第四节 良渚文化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237
一、龙山时代的纲领	237
二、玛雅—中国连续体的典型形态	246
三、传说稽证	252
四、良渚遗址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杰出案例	260
主要参考文献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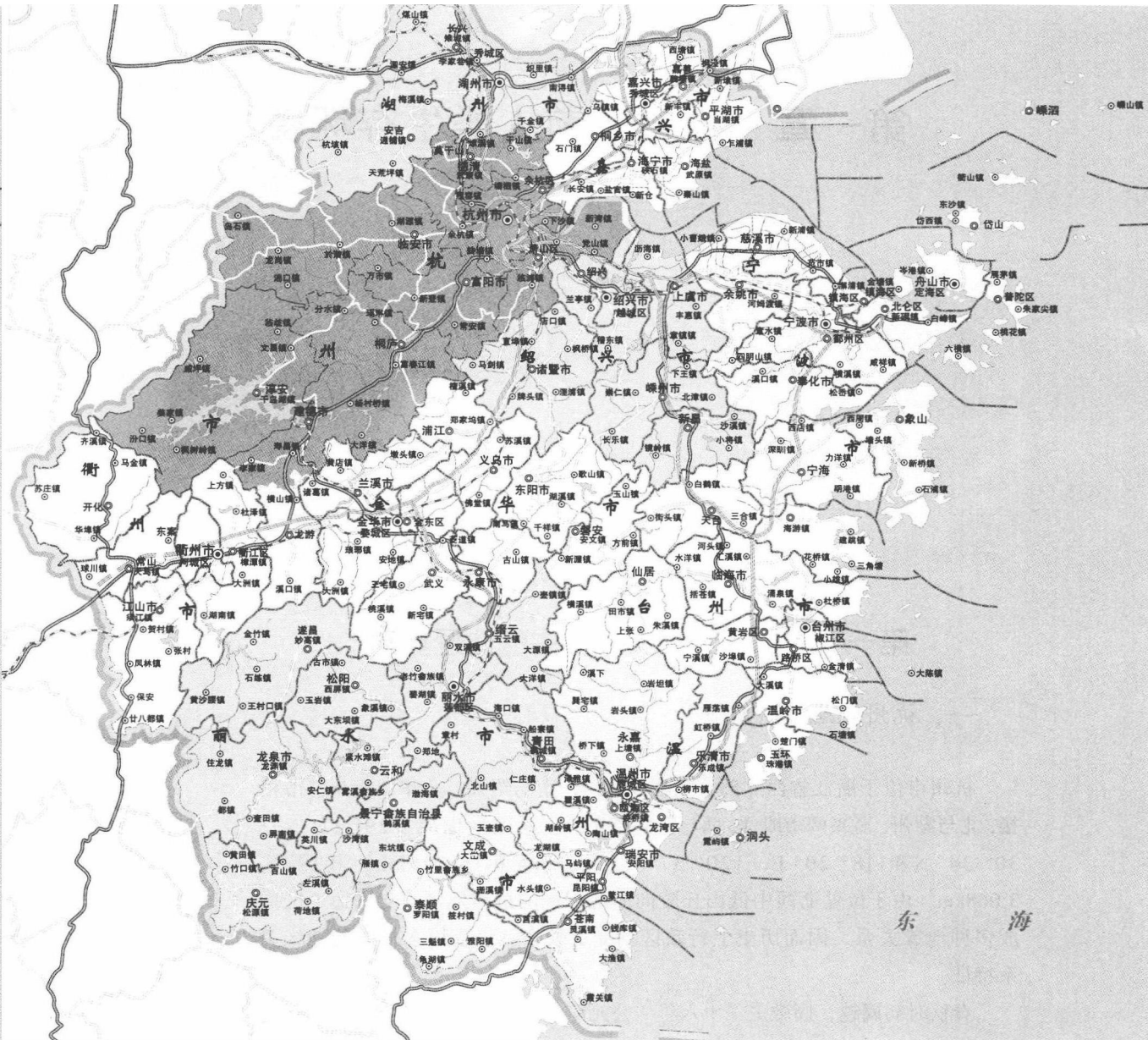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杭州史前人类生存环境

第一节 杭州原始文化发生的地理基础

一、杭州的地缘特征

杭州市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东临杭州湾，南与绍兴、金华、衢州三市相接，北与湖州、嘉兴两市毗邻，西与安徽省交界。地理坐标界于 $29^{\circ}11'N$ — $30^{\circ}34'N$ 和 $118^{\circ}20'E$ — $120^{\circ}37'E$ 之间，总面积 $16\,596\text{km}^2$ ，其中市区 $3\,068\text{km}^2$ 。由于位处浙西中低山丘陵向浙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与周边地区构成多种地缘关系，因而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较多，表现出多样态的地缘关系特征。

春秋时初属越，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属吴，周敬王三十年复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属楚。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灭楚，于今杭州地域内置钱唐县、余杭县，同属会稽郡。汉初实行王国、县与郡、县（道、邑、侯国）并行制，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至六年春钱唐县境属楚王国，六年春属荆王国，十二年属吴王国。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复属会稽郡，隶江都国。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江都国除，会稽郡西部都尉治（郡级治安军事机构）从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迁治钱唐县。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会稽郡隶扬州刺史部。平帝元始四年（4年）改钱唐县为泉亭县，王莽新朝（9—23年）因循。东汉初复钱唐县旧名，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并入余杭县。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余杭县属吴郡。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复置钱唐县。三国时钱唐县属吴国，并为吴郡都尉治，隶扬州。两晋时仍属吴郡，隶扬州。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吴郡属之，钱唐县隶王畿。大明八年罢王畿，吴郡和钱唐县复属扬州。齐武帝永



杭州市在浙江省的区位

明四年（486年）唐寓之以钱唐县为中心建立政权，国号吴。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以吴郡置吴州，侯景升钱唐县为临江郡（不久废），隶吴州。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年）置钱唐郡，郡辖钱唐、富阳、新城、于潜4县，隶吴州。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并桐庐、新城入钱唐县，割吴郡盐官（今海宁市）、吴兴郡余杭及富阳、于潜共5县置杭州。州治始设余杭县，次年迁钱唐县。开皇十一年依凤凰山筑城。文帝仁寿二年（602年）置杭州总管府，湖州武康县划属杭州。析钱唐县复置桐庐县，次年归属睦州。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罢总管府，改杭州为余杭郡，郡治钱唐县，辖钱唐、余杭、富阳、于潜、盐官、武康6县。大业十四年，析钱唐县复置新城县，属余杭郡。唐初罢郡为州，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余杭郡置杭州，为避国号讳改钱唐县为钱塘县。另以武康县置安州，后改武州。武德七年盐官并入钱塘县，新城并入富阳县，又于于潜置潜州，复置临水县，属潜州。

武德八年，废潜州，临水县并入于潜，于潜县仍属杭州。时杭州辖钱塘、余杭、富阳、于潜4县。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10道，杭州属江南道。贞观四年析钱塘县复置盐官县。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析富阳县复置新城县，杭州辖钱塘、富阳、余杭、于潜、盐官、新城6县。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析于潜县置紫溪县，垂拱四年析于潜、余杭县置临水县，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析紫溪县置武隆县，杭州辖县增至9个。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全国为15道，杭州属江南东道。天宝元年（742年）改诸州为郡，杭州复为余杭郡，郡治钱塘县，辖钱塘、富阳、余杭、于潜、盐官、新城、紫溪、临水、唐山（武隆县更名）9县。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再改余杭郡为杭州。同年，江南东道分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杭州属浙江西道。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唐山、紫溪并入于潜县，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复置唐山县。昭宗乾宁五年（898年）钱镠自润州移镇海军治于杭州，光化二年（899年）升杭州为都督府。光化三年复改临水县为临安县，桐庐县由睦州划属杭州。唐末杭州辖钱塘、富阳、余杭、于潜、盐官、新城、临安、唐山、桐庐9县。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钱镠为吴越王，次年升杭州为大都督府。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封钱镠为吴越国王，都杭州。龙德二年（922年）分钱塘、盐官两县各半及富春县之长寿、安吉两乡置钱江县，与钱塘县同城设治。州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富阳县改名）、桐庐、于潜、安国（临安县改名）、新登（新城县改名）、金昌（唐山县改名，后又改名唐山、横山、吴昌县）、武康（后梁开平元年从湖州划属杭州）共11县。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镠纳土归宋，杭州复降为州。同年，从杭州划武康县还属湖州，划桐庐县还属睦州。太平兴国四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10道，杭州属两浙道。次年罢道，并改杭州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太宗至道三年（997年）设路、州、县三级，分全国为15路，杭州属两浙路，为路治。州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富春县复名）、于潜、新城（新登县复名）、盐官、临安（安国县复名）、昌化（吴昌县改名）9县。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避金兵自扬州南渡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升杭州为临安府，亦称行在所。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分两浙路为东、西两路，浙西路治临安府。绍兴八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临安府治所钱塘、仁和两县升赤县（京都），辖余杭、富阳、临安、于潜、新城、盐官、昌化7县为京畿县。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恭帝德祐二年）元军攻占临安府，设两浙都督府，不久改为安抚司。次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至元十五年又改为杭州路，置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治于杭州，次年改称江浙行省，杭州为省治。杭州路治钱塘、仁和县，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新城、于潜、昌化8县和海宁州（由原盐官县改建）。明军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攻占杭州，十一月改杭州路为杭州府。同年十二月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府。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浙江行中书省为浙江

承宣布政使司，于省、府之间设道，杭州府隶浙江布政司杭严道，治钱塘、仁和，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于潜、新城、昌化、海宁（洪武二年降海宁州为县）9县。清世祖顺治初承明制，顺治二年（1645年）置浙江巡抚，驻杭州。顺治七年于杭州建旗营，置镇守将军署。圣祖康熙元年（1662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改为浙江行省。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置杭嘉湖道于嘉兴，杭州府属之。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年）杭嘉湖道移治杭州，杭州府辖县仍为明朝时9县。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宁县为海宁州。宣统三年（1911年）钱塘、仁和县裁撤，由府直辖，杭州府辖6县1州。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废杭州府，以原钱塘、仁和县地并置杭县，直属浙江省，并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省以下设道，以清杭嘉湖道范围置钱塘道，道尹行政公署驻杭县，辖杭县、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登、昌化等20县。民国16年废道为省、县二级制，撤销钱塘道，各县直属于省。同年5月划杭县所属城区等地设杭州市。同年10月市下设区，辖城区、西湖、江干、会堡、湖墅、皋塘6区。民国19年杭州市改为13个区（第一区至第十三区），民国23年合并为8个区（第一区至第八区）。民国24年浙江省设行政督察区，杭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嘉兴（后迁德清），杭州市仍为省直辖。民国26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州，沦陷期间原8个区改为7个区。民国34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杭州市政府、杭县政府迁回杭州，杭州市恢复8个区。民国36年杭县改省直属。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设为浙江省直辖市，并为浙江省省会。原杭州市第一至第八区依次改为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区。1950年6月上城、中城、下城3个区撤销。1951年12月杭县划属杭州市。1952年11月杭县又改为省直辖，杭州市复置上城、中城、下城3个区，并增置古荡、上塘两个郊区，共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笕桥、艮山、上塘、古荡10个区。1955年5月撤销古荡区，并入西湖区。1956年撤销艮山、笕桥、上塘3个郊区。1957年4月撤销中城区，所属街道分别划归上城、下城两区，时杭州市共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个区。同年9月杭县划归杭州市。1958年4月撤销杭县，原杭县的长命乡、瓶窑镇划归余杭县，其他35个镇、乡和余杭县的闲林乡划归杭州市。杭州市增置笕桥、临平、塘栖、三墩、上泗5个郊区，同年12月撤销，在所辖境域和江干、拱墅、西湖3个区的农村建置西湖、古荡、四季青、浙麻、塘河、笕桥、九堡、临平、亭趾、塘栖、东塘、四维、三墩、良渚、留下、上泗16个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底原属宁波专区的萧山县、建德专区的富阳县划归杭州市。1959年2月撤销拱墅区，在原笕桥、临平区的全境和塘栖区部分境域置半山联社，原三墩、上泗、拱墅区的全境和塘栖区部分境域置拱墅联社。1960年1月半山联社与拱墅联社合并改称钱塘人民公社联社，将所辖的笕桥公社划归江干区，又将原拱墅联社中的4个街道和塘河公社划出，恢复拱墅区。同年4—9月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区分别成立5个城市人民公社。同

年8月桐庐县从金华专区改属杭州市，并撤销富阳县并入桐庐县。临安县从嘉兴专区改属杭州市，同时撤销昌化县（含于潜）并入临安县。1961年3月上城等5个城市人民公社恢复区人民委员会职能，临安县的余杭、仓前等7个公社（原余杭县所辖地）划归钱塘联社，钱塘联社所辖上泗、留下公社划归西湖区。同年4月钱塘联社改制为余杭县。康桥公社划归拱墅区。同年12月析桐庐县原富阳、新登两县地重置富阳县。1963年5月建德、淳安两县由金华专区划属杭州市，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县。1969年初撤销西湖区，原西湖区南山、北山、西溪街道分别划归上城、下城、拱墅区管辖，以原西湖区7个公社和灵隐街道、拱墅区3个公社、江干区5个公社和笕桥镇建立杭州市郊区。1972年恢复西湖区建制，将原西湖区所辖4个街道和西湖公社分别从杭州市郊区和上城、下城、拱墅区划回，1975年12月又将原属江干区5个公社中的4个和笕桥镇从杭州市郊区划归。1977年撤销杭州市郊区，将原辖古荡、留下、袁浦等10个公社划归西湖区。1978年8月建立半山区。1988年萧山撤县设市（县级市）。1990年2月撤销半山区，并入拱墅区。1992年建德撤县设市（县级市），1994年余杭、富阳撤县设市（县级市）。1996年12月划出萧山市西兴街道、长河镇、浦沿镇设立滨江区。2001年3月12日，余杭、萧山撤市建区。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余杭、萧山8个区和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5个县（市）。

严州府地域秦时为会稽、鄣两郡辖境。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属楚王国，六年属荆王国，十二年属吴王国。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分属江都国及会稽郡，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属会稽、丹阳两郡。东汉时先属吴、丹阳两郡，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析丹阳郡置新都郡，治始新县（今淳安县威坪镇，后移治贺城镇），辖始新、新定（后改遂安）、黟、歙、黎阳、休阳6县，隶扬州。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仍治始新县，辖始新、遂安、黟、歙、海宁（休阳县改名）、黎阳6县，隶扬州。南朝宋时新安郡隶东扬州，齐时隶扬州，梁、陈时复隶东扬州。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寿昌县自吴郡改属新安郡，郡辖始新（郡治）、遂安、寿昌、歙县、黟县、海宁（黎阳并入海宁）6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新安郡，并遂安、寿昌入始新，改名新安县，属婺州。西部休宁（海宁县改名）、歙、黟3县置歙州。仁寿三年（603年）于新安县置睦州，辖新安、遂安、桐庐3县。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睦州为遂安郡，治所雉山县（新安县改名），辖雉山、遂安、桐庐3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改遂安郡为睦州，又于桐庐县别置严州。睦州辖雉山、遂安两县，严州辖桐庐、建德、分水3县。武德七年废严州，桐庐（建德县分别并入雉山、桐庐两县，分水县并入桐庐县）复入睦州，睦州改称东睦州，武德八年复称睦州，仍治雉山县。高宗永淳二年（683年）复置建德县。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州治由雉山县移建德县，属江南道，辖建德、新安（雉山县改名）、桐庐、

武盛〔如意元年（692年）复置分水县，改名武盛〕、遂安5县。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睦州为新定郡，属江南东道。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新定郡为睦州，属浙江东道，治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还淳（新安县改名，后又改青溪、淳化）、遂安6县。昭宗光化三年（900年）桐庐县划属杭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自杭州复属睦州。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升睦州为建德军节度。宣和三年改睦州为严州，属两浙路，治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青溪、遂安6县。南宋孝宗咸淳元年（1265年）升严州为建德府，属两浙西路，治建德县，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淳化县改名）、遂安6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建德府为建德路，属江淮行省，治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元末明初明军取建德路，改为建安府，不久改建德府。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又改建德府为严州府，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治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清承明制，严州府隶属浙江省金衢严道，府治、辖县不变。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废府设严州军政分府，属浙江军政府，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民国元年（1912年）10月严州军政分府废。民国3年2月于衢县以金、衢、严3府地置金华道，辖上述6县。民国16年废道，6县直属浙江省。民国20年设第六行政督察区。民国22年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昌化、于潜、孝丰、长兴、安吉11县。民国24年9月，在兰溪设第四行政督察区，建德、桐庐、分水属之；在衢县设立第五行政督察区，寿昌、淳安、遂安属之。民国32年5月增设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始设淳安，后移建德，辖建德、寿昌、淳安、桐庐、富阳、浦江6县。民国36年5月月底撤销第十一行政督察区，浦江县改属第四行政督察区，余5县直属浙江省。民国37年4月于淳安设第四行政督察区，建德、淳安、寿昌、桐庐、分水、遂安及常山、开化、新登、富阳10县属之。8月辖县减为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1949年5月，于建德设第四专区，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10月改称建德专区，专员公署驻建德，辖县不变。1950年3月建德专区撤销，建德、寿昌、淳安、遂安4县改属金华专区，桐庐、分水两县改属临安专区。1955年3月建德专区复设，专员公署驻建德，辖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水、富阳、新登、于潜、昌化、开化11县。1957年1月为适应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分建德县置新安江区，直属建德专署；9月临安、余杭两县由嘉兴专区划入，建德专区辖1区13县。1958年3月新安江区改为镇，直属建德县；11月寿昌县并入建德县，遂安县并入淳安县，分水、新登两县并入桐庐县，于潜县并入昌化县，余杭县并入临安县，富阳县划属杭州市。建德专区辖建德、淳安、桐庐、昌化、临安、开化6县。1959年2月建德专区撤销，建德、淳安、桐庐、开化4县划属金华专区，昌化、临安两县划属嘉兴专区。^{〔1〕}

^{〔1〕}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7—140页。

萧山建县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称余暨县。建县时间有秦汉两说。明嘉靖三十六年、万历十七年和清康熙十一年、三十二年《萧山县

志》认为秦置，乾隆《萧山县志》、民国《萧山县志稿》、来裕恂《萧山县志稿》、1987年版《萧山县志》则认为汉置。1987年版《萧山县志》载：“西汉初至元始二年（2年）间，始建县，名余暨，属会稽郡。”据明嘉靖《萧山县志》和《绍兴市志》载，西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已置余暨县，属会稽郡。县名“余暨”来由有三说：一说萧山地处暨浦（即浦阳江）下游，浦阳江经萧山而入海，地域上为暨浦之余，所以称余暨；二谓“暨”有“及”的意思，传余暨为越王无余教化所及，故名余暨；三是“余”为越语，越人称盐为“余”，因当时萧山产盐，又临暨浦，所以称“余暨”。新始建国元年（9年），改余暨为余衍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年）复称余暨。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会稽郡一分为二，钱塘江以西属吴郡，以东属会稽郡。三国吴黄武初年（222年）改余暨为永兴，仍隶会稽郡。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改会稽郡为会稽国，永兴县属会稽国。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会稽国复为会稽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永兴县，并入会稽县。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复设永兴县，隶越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萧山。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占领萧山，为避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之名讳，改“萧山”为“苕珊”。至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复称萧山。^[1]

^[1]萧山县志编纂

委员会：《萧山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萧山市志编纂委员
会：《萧山市志》，方
志出版社2001年版。

自然地域关系或行政地域关系的建立主要与地缘、民族、文化和战争等因素相关。就较为广大的范围来说，杭州在春秋战国之际曾长时期属于楚国。楚国兴起于长江中游，战国时期基本统一中国南方的江汉、江淮地区，囊括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的全部，西部包括四川部分，北部及于陕西、河南、山东，南部到达广东、广西、贵州，是战国七雄中仅次于秦国的疆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大国。其有记载的历史超过800年。楚文化则融合了巴濮、南蛮、东夷及吴文化、越文化，覆盖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成为中国南方的代表性主流文化，影响遍及南中国。其巫骚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崇尚自然的道家精神，与中原儒家礼教分别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象征。秦汉政治统一后，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但楚文化仍在不同层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杭州居于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从地缘关系上说易于统合整个中国南方文化。杭州又主要居于长江三角洲南翼最大的水系钱塘江北岸，因此行政关系主要建立在吴文化区域。历史上的钱唐县、余杭县多属吴国（郡、州）区域，杭州设郡、州、府后则常与杭嘉湖平原的一些县共构为行政单位。同时，由于钱塘江的勾连，杭州又与钱塘江上游浙西中金衢盆地的一些山区县共构行政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反映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由山区进入平原的迁徙特征。另外，杭州又处于钱塘江河口地区，即历史上吴、越两国的交界线，而钱塘江直至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几千年仍然是一条动线，与宁绍平原的变迁相维系，所以杭州也与宁绍平原的郡、州、府或县建立行政关系。

上述行政关系反映了杭州自远古时代以来形成的多向度的地缘特征。